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朱德与八路军



一、誓师东渡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西南郊卢沟桥畔宁静的夜空被炮声所打破。日本侵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神圣抗战——抗日战争揭开了序幕。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站在民族救亡的最前列。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驻守平津的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他们代表千万名红军将士表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为了早日实现奔赴抗日前线，消灭日寇的愿望，中共中央和红军加紧出师前的准备工作。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致电中共中央，请缨抗战，要求迅速派先遣师开赴河北，援助二十九军。7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召开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去。7月14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10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同时，中共中央还向蒋介石传达了“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的信息。这一天，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为了表明红军奔赴前线抗日的决心和勇气，慨然写下一篇誓词：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zh^u）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23日抵达云阳镇。随后，朱德与红军高级干部着手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等工作。

还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多次的谈判，但都没有达成协议。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能保留2万人，取消政工人员，由国民党向红军派辅佐人员（包括各师参谋长和排以上各级副职干部）指挥，改编后服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对这些无理要求，中共谈判代表据理力争。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7月28日提出：红军改编必须坚持3个师，共45000人，3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次日，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然而，蒋介石不同意中共的要求。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落入日寇之手，引起全国震动。

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4日，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南京。6日，朱德和周恩来由云阳抵达西安，并于9日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同机飞抵南京。

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发言。面对众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他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

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朱德在发言中还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目前敌人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

在南京，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继续就红军改编问题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尽早开赴前线参战，但他对战局发展有一种错误认识，希望把战事局限在华北。因此，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他始终不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坚持红军改编为3个师，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对此，中共中央予以拒绝。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正应验了两天前朱德的预测。日军进攻上海，把战火烧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使蒋介石感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对红军改编的无理要求，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了这项任命。

国共两党在红军改编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为尽快完成改编，早日出征，朱德提前于8月16日离开南京，19日回到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二天，朱德和彭德怀率红军全体将士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书中说：

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红军将士还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8月22日，由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改编成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先遣队，率先从陕西三原出发，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走上了抗日的新战场。

这时，朱德赶到了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会议从22日至25日共进行了三天，着重讨论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抗战中的作战方针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上朱德多次发言，主张红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他指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支持华北。华北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洛川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和周恩来任副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命令要求各师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9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八路军虽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在人民群众中仍习惯称之为八路军。

正是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实现团结御侮对日抗战，毅然放弃了具有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肩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昂首走向抗日的最前线。

9月3日，继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华北前线，一二九师也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誓师，随即整装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9月6日，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举行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只见八路军出征将士整齐列队，《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此起彼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震撼长空。朱总司令神采奕奕地站在主席台上，率领八路军健儿高声朗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誓师大会以后，八路军总部向韩城县芝川镇进发，准备在这里渡过黄河。渡河时，黑夜沉沉，高原寂静，北斗星高挂天空，黄河奔腾咆哮。朱总司令站在黄河岸边，和几位八路军领导人指挥总部队伍平安而迅速地渡过了河，而后，他和任弼时、邓小平和左权等同乘一条船渡过了河。从此，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将士在战火纷飞的华北大地上，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首战平型关

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渡过黄河后，即刻向山西侯马前进，准备从那里乘火车北上。一路上，处处可见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和从前方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候，华北战场上有70—80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疯狂进攻面前除一部分进行了抵抗外，大部分一触即溃。先于八路军总部开进山西的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国民党军队垮得一塌糊涂，真是兵败如山倒！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等东西，象潮水般地涌

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我们的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拚拚？”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

和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照，八路军将士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日夜兼程奔赴抗日最前线。人民群众看到真正抗日的军队开来了，无不欢欣鼓舞。八路军所到之处，人们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八路军总部乘火车向北开进，沿途各站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当他们得知那位向人群不停地招手、衣着和别的军人一样、脸色比别人黑一点、像长年辛劳的庄稼汉的长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朱德总司令时，人们不禁大发感慨：“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这样，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之间建起了一座紧密联系的桥梁。人们迫切期待八路军早日参战并取得胜利。八路军将士肩负人民群众的重托，也迫切希望与日寇一战，打击其狂妄气焰，鼓舞人民斗志。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继续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战争。9月初，敌人兵分3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南进犯，其中平绥路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一路敌人又分成左右两翼：右翼在占领大同后，沿同蒲铁路进犯雁门关；左翼由蔚县、广灵、涞源进攻平型关，而后与右翼会合于雁门关。敌人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会同沿石太铁路西进的敌人攻占太原，奇取山西，达到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

日本此举使得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感到他的腹心地区受到威胁，他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于是，阎锡山在会见刚刚到达山西不久的朱德时，要求八路军尽快上前线，配合他的军队抵御日军的攻势。

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法，朱德主张不采取国民党军队那种“节节防御的办法”。他认为，这样摆起来，要想处处防守，结果什么地方都没有防守得住。我们八路军专门打敌人的侧后方。根据这一想法。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命令八路军兵分两路迎战日军。一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一二师，驰援雁门关；另一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一五师，沿同蒲路向平型关急进。

平型关是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的重要隘口。关前有一条山路，蜿蜒在群山沟壑之间，通向灵丘、涞源，地势险要。9月23日，阎锡山电告朱德：22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这时，一一五师日夜兼程已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朱德、彭德怀立刻电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电告毛泽东：“灵丘之敌于昨晚迫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一一五师为了打好平型关这一仗，召集了全师干部战前动员会，介绍了敌人行进情况，我军的战斗部署，强调了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第五师团，也叫板垣师团。这个师团的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早在1929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军

衔是大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就是板垣。由于侵略中国有功，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板垣已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这时候，板垣选择平型关作为进军路线，是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地带，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因此气焰很嚣张。他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很快地渡过黄河，他根本没有估计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

9月24日，我军前沿部队报告，敌人可能在第二天大举进攻。傍晚，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在研究了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后，用电话果断地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当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指战员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能任凭阵阵秋雨浇透征衣，在崎岖的山沟里向前行进。经过大半夜行军，部队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汽车路两侧高地。这里是日军开往平型关的必经之地，居高临下，地形很好。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在瑟瑟秋风中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着战斗打响。

9月25日清晨，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进入了一一五师的伏击地。这股敌军共4000多人，走在前面是100余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大车，除了军用物资以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敌人自南下以来，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显示出骄横和得意洋洋的样子，警戒异常疏忽，如入无人之境。

7时整，冲锋号吹响。部队居高临下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打乱了其指挥系统。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随即，战士们勇猛地冲向公路，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立时，山沟里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日军士兵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顽强地抵抗，但终究抵挡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向西逃窜了。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灭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大车200多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炮弹2000多发，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战马50余匹，其它武器辎重甚多。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欢腾。致敬电、慰问电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连蒋介石也发来了祝捷电。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吹嘘，一扫抗战以来的失败主义空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八路军在华北首战告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威望，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强调，红军（八路军）必须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八路军东进时，按照预定的战略计划，部队集中向冀（河北）、察（察哈尔）、晋（山西）、绥（绥远）4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但是，华北日

军采取大迂回的姿势包抄太原，恒山山脉便成为敌人夺取冀、察、晋 3 省的战略中枢，敌人在这里频频出动主力，使得阎锡山所率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鉴于这种新形势，毛泽东于 9 月 17 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基本上不适用了，如依原计划执行，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的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将部队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本身。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重要的战略部署，朱德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迅速将八路军各部由集中行动改变为分散行动，并大体划分了各部的活动区域：一一五师控制五台山、恒山，活动于晋东北，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控制管涔（c6n）山，活动于晋西北，并以一部到冀西活动。9 月 28 日，朱德、彭德怀致电中央，建议一二九师迅速出动，暂在娘子关南北活动。9 月 30 日，刘伯承师长率一二九师先遣队从陕西富原县庄里镇出发东进，首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随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此外，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还率领一批干部，前往日军尚未到达的晋西吕梁山地区开辟工作。

10 月初，日军继续加强对正面防守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2 月，攻占了雁门关。国民党守军放弃了雁门关到平型关以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南一线阵地，并调集 16 个师兵力，以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进行忻口会战。同时，由孙连仲等部在娘子关一带阻敌西进，以策应在晋北的主力决战。这时，朱德、彭德怀等致电中央，表示“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信心，渐次改造友军，推进民主，扩大（八路军）本身。”毛泽东回电同意他们的意见。随之，八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有力的动作，积极地配合友军作战。

10 月 13 日，日军第五师团出动 5000 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向忻口发起猛攻。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挺进雁门关以北地区，威胁大同；一一五师占领平型关，袭击敌汽车，破坏道路。14 日，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在小寨附近截击了日军汽车队，并夺回了平型关等地。18 日，一二九师主力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回了雁门关，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19 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陈锡联团在朱总司令的亲自部署下，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成功，一时传为佳话。

忻口会战中，日军飞机活动很猖獗，除了运送物资外，还不断轰炸友军阵地，使友军损失很大。这时，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陈锡联团到达前线，暂由总部指挥。朱德、彭德怀将这个团部署在阳明堡、崞（gu#）县之间，并要求友军李默庵部协助袭击日军，以便该团能破坏日军飞机场。19 日夜，当朦胧的月亮躲到一大团黑云中去时，三营的赵宗德营长率领一个连的战士，躲过了敌人的岗哨，进入到机场里。他们急步向前，打算先消灭驻守机场的日军，占据机场。然而，敌人发觉了，并向机场开枪。在飞机上睡觉的敌飞行员也被惊醒，在机上慌乱地开枪。八路军健儿们隐蔽在机身底下，扔着手榴弹，很快，一架架飞机燃烧了起来，总共炸毁日机 24 架。当八路军总部将这个信息转告友军时，他们最初还不相信。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日机没有来，从太原派出侦察机到日军机场侦察后，这个消息才被证实。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中国军民在这里坚守了近1个月，使日军伤亡约4—5万人。其中，八路军袭击敌后方交通线，断绝其交通，沿途杀伤的敌人不亚于正面战线的人数。但是，由于国民党守军指挥失策，娘子关失守，致使整个战局陷于被动。11月8日，太原陷落。这标志着华北地区正规战争的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太原失守后不久，朱德于11月11日在晋东南和顺县石拐镇召集八路军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对八路军主力在山西开创抗日根据地和从事游击战争，作了新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除聂荣臻所部以五台山、恒山为中心，以晋东北为基地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到吕梁山区，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支点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以晋东南为基地，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队大批撤退，影响了华北一部分人民的抗日信心，为此，八路军总部及时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等鼓舞人心的口号，决心和华北人民共同坚持敌后抗战。此后，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广泛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根据地是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它地处平绥、平汉、同蒲、正太铁路之间，太行山、五台山和恒山山脉连绵交错，极利于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平型关战斗后，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总部特务团、一一五师骑兵营及一二〇师派遣的工作团等2000多人，以五台山为依托，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艰难历程。这时，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带处在极端混乱状态中，难民四散，国民党军队撒手南逃，土匪峰起，日军南进而造成后防空虚。一一五师进入该地后，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相继收复蔚县、涞源、曲阳等20余座城镇。同时，冀西、晋北、冀中、察南等地区，也开始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根据地，收复了50余座县城。11月7日，奉朱总司令之命，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军区的成立为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召开，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年春天，肖克率一个支队挺进到北平的西山一带，开辟了平西根据地。4月，在冀中成立了行政公署，建立了冀中根据地。6月，八路军四纵队进入冀东，策动了冀东20万人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开辟了冀东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开辟，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力量不断增强。日军对根据地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扫荡”，都被根据地抗日军民所粉碎。

晋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及绥远东南部，所辖46个县，两个省会（太原和归绥），面积33.1万平方公里。1937年9月，贺龙、关向应等率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防御作战，一方面开辟抗日根据地。11月太原失守后，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年底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日军乘机向晋西北发起进攻。一二〇师奉命回师，与敌激战20余日，收复7座县城，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8月，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率七一五团等部约2000人，北出绥远，同当地抗日游击队会师，在绥中、绥西、绥南、察哈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于年底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至此，晋绥根据地初步形成。

晋冀鲁豫根据地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地区。1937年11月，一二九师在正太路痛击日军以后，进入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部队除主力保持机动外，组成若干游击部队和工作团，深入晋东南和平汉路以西的晋冀、晋豫边以及冀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收复了辽县（今左权县）、襄垣、沁县、屯留、长治等18座县城，奠定了晋冀豫、冀南根据地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各以主力一部进入冀南和平汉路以西的冀豫边地区，开辟了漳河以南、道口至清化铁路以北的豫北地区。1939年2月前后，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1940年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挺进冀鲁豫边区，成立了冀鲁豫军区，冀鲁豫根据地基本形成。这样，在华北大地上一块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它西迄同蒲路，东至津浦路，南衔黄河，北接正太（铁路）、石德（公路）二路，并与晋察冀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以及新四军开辟的华中根据地相接，使华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山东根据地含渤海、鲁中、鲁南、胶东、滨海5个地区，包括山东及江苏、河北各一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和发动了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和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等组织，为山东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到1938年6月，在盐山、乐陵、文登、长山、徂徕山等地，党组织领导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武装，逐步开辟了10个抗日根据地，还普遍建立了县及县以下各级抗日政权。为统一领导，1938年12月成立了中共山东分局，各地抗日武装统一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各一部进入冀鲁边区，将该地区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建立了冀鲁边区根据地。1939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统一指挥山东及苏北地区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党政军领导机构健全与统一，抗日武装力量的整编，地方政权的普遍建立，表明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武装力量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八路军在华北创建的广大根据地，不仅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可靠的兵源和必要的给养，而且得到了抗日群众和民兵的全力支援。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到1940年，建成了将近一亿人口的大小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人数达到50万人。敌后广大抗日军民同日伪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疯狂围攻和“扫荡”，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到1940年，八路军及新四军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8%和伪军的全部，总数达70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重要战场。

四、朱总司令在敌后

佇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
夜夜杀倭贼。

这首诗是朱总司令在转战太行山、指挥八路军英勇作战过程中写下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八路军健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日寇的决心和勇气。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朱总司令本人的真实写照。

太行山脉北起滹（h&）沱（tu\$）河，南抵黄河，绵亘在山西、河北等省之间。它居高临下，地势险峻，向东可控制河北、山东，向西同太岳山相接，

中间的盆地是晋中富饶之地；北面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相邻。正是由于太行山重要的地理位置，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山，指挥着整个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1938年2月，朱德和左权率总部离开山西洪洞县的马牧村，准备前往太行前线。这时，山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占领太原后，经过一段休整，又从北面和东南向晋南大举进攻。北路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进展较迅速，但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正在晋西南活动，加上晋南集结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所以，对这一路日军，中国军队是有所准备的。然而，在东路的中国军队部署很分散，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还在正太路一带活动，这样，东路日军在2月20日攻占长治后，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时，并没有足够的中国军队来阻击他们。

2月21日，朱德到达当时安泽县县城所在地岳阳镇。根据战局的变化，他命令友军赶到屯留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太路南下。而这时，朱德身边只有两个警卫通讯连，约200人。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实现安全转移是很容易的。但是，朱德却考虑到，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听任日军长驱直入，攻占临汾，于整个山西战局十分不利。因此，他毅然决定：率身边200名警卫通讯战士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阻击一个旅团的日军。

2月24日，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未能根据命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少数部队前往阻击。傍晚，友军接近屯留，朱德急令其夹击日军，情况有所缓和。第二天，友军没有能阻止住日军西进，局势更趋严重。朱德继续率部阻击日军。这时，日军侦察到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于是派出10多架飞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的所在地古县镇。可是，日军飞行员把安泽的古县镇和屯留以北的故县搞混了，结果故县被炸成一片火海，古县则平安无事。晚上7时，日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撤出镇外。此时，友军从临汾派来5个营的援兵，布置在尧店一带。朱德命身边警卫部队同友军夹击日军，八路军战士英勇作战，从侧面袭击了日军，还缴获两门炮和几挺机枪。而友军不但没有出击，反而被日军突破了防线。

在朱德率极少兵力阻击日军之时，外界完全失去了他的消息。几天里，大后方的许多人，包括对中共和八路军友好的外国友人，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实际上我们的朱总司令却仍在前线稳如泰山，指挥若定，牵制阻击敌人到第三天，才离开大路，并继续从侧翼攻击敌人。

到2月27日，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到，这是一支新扩建的部队，每个战士手中仅有两颗手榴弹。朱总司令决定用这支新兵部队袭击日军后续辎重部队。当敌人的几十辆卡车驶到面前时，新兵们将手榴弹一齐投向卡车，顿时火光冲天，敌人死伤无数，还缴获大量装备，这对进攻临汾的敌人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朱总司令以一个革命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为他人之所不敢为，亲率两个连的兵力阻击敌人一个旅团达3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在抗日军民中树立起了八路军英勇无畏、誓死抗敌的光辉形象。

3月10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3月15日到达沁县的小东岭村。3月24日，作为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在小东岭村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会议共同制定了晋东南国共两军统一对敌作战方针。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为了让友军加深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邀请与会者实地参观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的一次伏击战。一二九师在徐向前指挥下，在邯（郸）长（治）公路最理想打伏击战的响堂铺埋伏下部队。3月31日上午，当日军第十四师团所属两个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打响了，仅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随后又打退了日军增援部队。此次战斗烧毁敌汽车180多辆，击毙日军官兵170人左右，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这次实地观战增强了友军将领对游击战的信心和勇气，显示了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术的技巧以及朱总司令坚定自若、胸有成竹的非凡气度。

八路军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使日本侵略军感到八路军“其威势已不容轻视”。于是，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加紧进行讨伐。从1938年4月开始，日军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用3万以上的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九路围攻”，妄图消灭八路军总部。

朱总司令从一二九师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觉了日军的意图。他果断决策：以一部兵力箝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他把刘伯承、邓小平（1938年1月18日起任一二九师政委）、徐向前率领的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主力，命令他们转入外线，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同时，还命令八路军其他部队及部分友军部队，从侧后昼夜袭击敌人，以达到迷惑、疲劳和分散敌人的目的。

4月10日，“九路围攻”的主力南路日军向北发动进攻，其指挥者是骄横的苔米地旅团长。此人在2月间曾率部与朱德在临屯公路上交过手。这时，不可一世的苔米地指挥日军占领了沁县和武乡县城。八路军总部处境异常危险，经常需要转移驻地。一次转移中，朱总司令身边仅仅有一个警卫排。当他们来到漳河边的一座小山上时，发现三面都是敌人，一面又是漳河，形势非常危急。朱总司令临危不惧，当即决定向漳河对岸转移。此时漳河水猛涨，渡河很困难。朱总司令亲自察看水情后，让一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过河，并带过去一根粗绳子，固定在对岸。而后，他一手抓着马尾巴，一手抓着绳子，和其他人一起渡过了漳河，脱离了险境。

随后，朱德、彭德怀致电转移到外线的一二九师，命其火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准备攻击从武乡城撤出之敌。4月16日拂晓，一二九师主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夹击日军。战斗持续到黄昏，共歼灭敌人元熊弥师团的柏崎联队和苔米地旅团的工藤联队2200余人，击毙战马500多匹，缴获大批枪支和军用品。骄横的苔米地因作战失利而受到惩处。

长乐村一战是八路军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南路日军遭受重创后，其他各路日军也纷纷退却。不到半个月，在朱总司令指挥下，日军的“九路围攻”计划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八路军开辟的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朱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在华北转战，神出鬼没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总司令所说：“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朱总司令自己非常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根据地的老百姓

姓中至今仍传诵着关于他的故事。

山西武乡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较长时间住在该县的王家峪。在一座普通的农窑院前，朱总司令和他的警卫战士种植着一个小菜园。人们常见朱总司令到菜园培土锄草，浇水施肥。园内一格格的菜畦上水灵灵的萝卜、紫都都的茄子、红艳艳的辣椒，一茬接一茬。他种的山药蛋象红薯一般大，工作之余，朱总司令总爱和老农坐在田头一边抽着烟，一边谈心，而且话题总是无所不包，从种庄稼到民主建政、从减租减息到坚壁清野……。

朱总司令刚到王家峪时，因为保密，乡亲们起先并不认识他。有人见他和炊事员抬着大锅送过饭，就管他叫老伙伙；有人见他有空就开荒种地，待人和蔼可亲，又以为他是总部的老管理员。直到人们发现朱总司令后面常跟着几个挎“盒子炮”的，这才知道他是这里的“一号”首长。后来时间长了，乡亲们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位普通得像老伙伙、朴实得象老农民、温和得象老母亲的“一号”首长，就是那位使人民开颜、令日寇胆寒的八路军总司令。

离王家峪不远的砖壁，也是八路军总部常住的地方。在那里流传着一个朱总司令吃野菜的故事。一天，岳大娘在山上挖野菜，刚巧碰上朱总司令。总司令问她挖什么菜？大娘答是苦苦菜。总司令又问：除了这个菜，还有啥子能吃的呀？说着蹲下身来，要她一样一样挖给他看，有莎蓬、刺角叶、灰灰菜等。大娘好生纳闷：总司令成天忙打仗，问这个作甚哩？总司令拿起一把野菜闻了闻，笑着说：“好啊，我们也要吃！”不久后一天，朱总司令请岳大娘和左邻右舍来吃饭，特意端出一大盆野菜请大家尝尝，他微笑地问：“野菜这样做对不对头？”自此以后，朱总司令带头挖野菜、吃野菜，把省下的粮食送给老乡。

在朱总司令的带动下，八路军深入华北广大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新政权。县县区区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村村镇镇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一批又一批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从城镇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处处出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五、打退反共高潮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蒋介石采取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他害怕人民群众力量的壮大，害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发展。抗战初期，当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之时，蒋介石、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溃逃，放弃了大片国土。当八路军进入华北，打了几个胜仗，夺回许多失地并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自来“恢复失地”。1938年11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转而加紧对国民党高层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蒋介石这时候虽然仍继续抗日，但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民众运动加以种种限制，调集重兵袭击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

还在1938年6月，蒋介石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指望他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蒋介石还在鹿身边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冀中恶霸张荫梧就是其中一个。12月，蒋介石又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随后，国民党政府又将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

击司令孙殿英部及河北保安团等武装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其中，朱怀冰部在国民党军队中力量较强。这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限共、扩大磨擦的决心已定。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又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掀起了反共高潮。

这时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不仅要对付日军疯狂残酷的“扫荡”，还要提防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但是，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首位，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朱德明确指出：“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八路军各部主力仍继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扫荡”。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逆行却越演越烈。1939年6月11日，张荫梧乘日军对晋察地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主力在前线作战之机，亲率3000多名“民军”，偷袭、包围冀中根据地驻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官兵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12月，阎锡山指挥在山西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新军和八路军三五八旅，残酷杀害我抗日干部、共产党员、进步分子600多人，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使共产党、八路军忍无可忍，不打退他们的嚣张气焰，就无法进行抗日。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制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朱德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领导了华北反磨擦斗争。

1939年7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当八路军在极为艰苦环境中同日军殊死作战时，顽固分子张荫梧率部从背后袭击包围八路军赞皇工作团，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10多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和文件抢劫一空。10多天后，张荫梧再次袭击赞皇工作团及八路军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当地八路军指战员和老百姓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朱德强烈谴责顽固分子的行径，他于8月15日和彭德怀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奉命率一二九师一部于8月24日一举歼灭张荫梧部大部，27日又全歼其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顽固派军队中，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因而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1940年2月18日，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指战员100多人。朱怀冰还在这时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他蛮横地问朱德：究竟是让还是打？朱德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听罢仍旧威胁要打。朱德严厉地告诫他：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朱怀冰在朱德面前碰了个硬钉子，但他并未就此罢手。一场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2月21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顽固派军队作出了部署：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其他各部中立。石友三早就勾结日寇准备投降。八路军在掌握其通敌证据后打算彻底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后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3月4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打击石友三部的命令，到11日，全歼该部，共毙、俘其3600多人。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后被枪决。

3月5日，八路军总部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朱怀冰自恃实力很强，实际上不堪一击。战役只打了5天即将其打垮。此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七军及杂牌武装1万余人，俘获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等军官及朱怀冰的妻子。

歼灭朱怀冰、石友三部以后，顽固派在华北再也没有力量同八路军搞大规模的磨擦了。国民党发动的这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一再坚持以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朱德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停止攻击，作出适当让步，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下一步国共谈判打开大门。当追击朱怀冰部时，有人提出活捉鹿钟麟，朱德指示不要捉，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让他跑掉。对俘获的朱怀冰部军官及朱怀冰之妻，八路军加以优待，不久即全部释放。

就在八路军反击顽固派之时，蒋介石一再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攻八路军。卫立煌出身寒微，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在忻口会战时，他与朱德协同指挥作战，打击日寇，彼此对对方印象很好。卫立煌对八路军英勇抗战内心很敬佩，朱德也赞赏他的积极抗日态度。于是，两人成为挚友。此时面对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很为难。他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方针，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因此，中央同意朱德前去洛阳同卫立煌谈判，解决划分防区、停止军事冲突、继续团结抗日以及八路军扩编增饷等问题。这时，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党的七大，希望朱德能早回延安。

在洛阳，朱德与卫立煌进行了融洽的会谈，但是朱德提出的要求，有些事情卫立煌作不了主，问题终究还是无法解决。蒋介石希望朱德能作出让步，并要朱德在会谈后去重庆见他。这时，赴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同蒋介石谈判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与蒋介石谈判，朱德不再去重庆，直接回延安。

1940年5月中旬，朱德离开洛阳，乘火车经潼关抵达西安。在西安逗留数日后，他乘大卡车，把一批要去延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同时还带去一大批延安急需而又为国民党禁运的通讯器材。途中，朱德提议去拜谒黄帝陵。在陵前，朱德即席讲话，他说：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5月25日，朱德一行平安到达延安。此后，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直至抗战最后胜利。

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短短的近3年时间里，八路军在敌后开展

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光复大片国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有这一切同朱德是紧密相联的。

六、百团大战

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以后，实行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狂妄地吹嘘“3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日军万万想不到的是，八路军挺进华北以后，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地，在他们的后方连连出击，即使其精锐部队也连吃败仗。日军于是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为“心腹大患”。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不断增兵华北，由原来30多万猛增至60多万，占其侵华总兵力的一半。日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抗日根据地，并称之为“扫荡”。同时在根据地周围修筑据点碉堡，构筑封锁线，通过“蚕食”边缘地带向根据地腹地压缩。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及“清乡”，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采取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办法，积极主动地打击、消灭敌人。日军一次次地“扫荡”，一次次地受挫，就连日军中将、号称“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也于1939年11月在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这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乃至抗日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敌人对此十分懊丧，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为阿部规秀之死写了个挽联：“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日军在军事上受到沉重打击后，转而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进行更为疯狂残酷的“扫荡”。多田骏提出了为配合“扫荡”的“囚笼政策”，其措施是：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敌占区向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对抗日军民进行压缩包围。日军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扼杀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对此，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成为八路军同日军斗争的焦点。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日军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投入重兵加以保护。八路军开展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太路以及同蒲路上。

1940年7月22日，已回到延安的朱德和正在华北敌后的彭德怀、左权向八路军各部正式下达破袭正太路的预备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打破敌人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人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的“扫荡”较为缓和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战役主要在正太路沿线进行，以截断其交通为目的。命令规定直接参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并在8月10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这个命令同时上报了中央军委。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正式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部署和作战的地域划分作出具体规定：晋察冀军区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不含）段，对北宁、津浦路德州以北段，德石、沧石、沧保各路及平汉路元氏至卢沟桥段亦同时进行破袭；一二九师及总部炮兵团一部破袭正太路平定（含）至榆次段，同时对平汉路元氏至安阳段、德石、邯大、白晋、临屯、同蒲路榆次至临汾段进行破袭；一二九师破袭平遥以北之同蒲路及汾（阳）离（石）公路。这个命令还规定，此次战役于8月20日开始。

8月20日晚10时，华北地区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打响了。由于八路军指

战员和根据地民众参战积极性非常高，参战总兵力超过了原来的规定，达到105个团，因此，八路军总部把这次战役称作“百团大战”。

战役一开始，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在总部指挥下向各线之敌同时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在正太路，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好似猛虎下山，扑向敌人踞守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响彻全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强攻天险娘子关，经过3小时的反复冲击，夺取了敌人修筑的4个大型堡垒，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娘子关。同时，晋察冀军区部队重点攻击了井陘煤矿。在矿区工人的积极配合下，部队经过一夜激战消灭了矿区之敌。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敌人多处重要据点。一二九师部队对汾离、忻（县）静（乐）公路及同蒲路朔县至宁武段进行了破袭。至9月初，各参战部队基本完成正太路等线的作战任务。这时，日军调整兵力，由榆次、阳泉、石家庄等地增援正太路。八路军伏击其援军。9月6日，一二九师一部在榆社以西双峰镇歼灭由同蒲路来援之敌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400余人，大队长永野被击毙。9月10日，各参战部队根据总部命令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战役第二阶段从9月20日开始。主要作战目标是继续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进行破袭战，重点在于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一二九师在9月23日至10月4日的榆辽战役中攻克小岭底、石匣等据点及榆社县城，同时还破袭了白晋路北段、同蒲路祁县至霍县段及长治至潞城的公路。冀南军区部队破袭了平汉路高邑至彰德段。晋察冀军区在9月22日至10月9日进行了涞（源）灵（丘）战役，攻击涞源城未果，遂将其外围10多个据点攻破。冀中军区发动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攻克据点20多个，破坏公路150多公里。一二九师再度破袭同蒲路北段，切断了该路交通。

八路军一个半月接连不断的破袭战，使日军遭受沉重打击。为挽救局势，敌人急调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从10月6日开始，战役第三阶段由破袭战转入反“扫荡”。敌人的“扫荡”首先从晋东南开始，而后扩大到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不及休整的八路军立刻投入反“扫荡”。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各地采取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法，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到12月上旬，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至此，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结束。

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主动积极向日军进攻的大会战，战役中，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0余人、伪军18000余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拔除据点2900多个，一度收复40多座县城，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在26个以上。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受到重创。百团大战还打破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切断了敌人的经济运输，破坏了敌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破坏了井陘煤矿，使敌人不能利用我华北的最大煤矿，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

百团大战的胜利鼓舞和动员了敌后军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位和威望，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对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陕甘宁边区后，各界人士兴奋异常，纷纷举行

热烈庆祝活动。毛泽东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去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朱德受到了热烈欢迎。此外，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对百团大战也交口称赞。卫元煌来电说：“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他还命令在晋南的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作战。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对八路军要“特电嘉奖”。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不仅表现出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奋勇杀敌的气概，还充分体现出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聂荣臻司令员拯救两个日本小姑娘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进攻井陘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救起两个日本小姑娘，一个五、六岁，一个尚在襁褓中。她们的母亲在战火中死了，父亲是井陘火车站日本副站长，受重伤后殒命。聂荣臻指示将两个孩子带到指挥部来。他亲自拿梨给大一点的孩子吃，还亲自喂粥给她喝。聂荣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兴子”（以后知道她真名叫美穗子）。兴子在指挥部停留期间，一直跟着聂荣臻，他走到哪里，她就用小手拽着司令员的马裤腿跟到那里。后来，聂荣臻考虑在激烈的战斗中身边带着两个小孩子会有很多困难，把她们留在异国他乡也会引起她们伤感，于是，他找到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用挑子把两个孩子送到石家庄去。临行前，聂荣臻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傍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客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汤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两个日本小姑娘送走了，她们是否平安回国了，聂荣臻司令员常常为她们担心。40年的光阴过去了。1980年，在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努力下，在日本九州找到了“兴子”，她的真名叫美穗子，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当年送到石家庄后不久就死在医院里。

为了表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美穗子带全家来到了中国。她见到了救命恩人聂荣臻司令员，不禁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聂荣臻对她说：“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

是啊，八路军是正义之师，是人民的军队。他们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决不与日本人民为敌，他们仇恨日本侵略者，却决不伤害无辜的日本平民。这种国际主义精神、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充分发扬，显示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浩然正气。这样的军队必将攻无不克，无坚不摧。

七、朱总司令与南泥湾

百团大战以后，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推行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型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磨擦，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因此，从1940年以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物资奇缺的困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这里是土地贫瘠的高原山区，经济落后，全边区只有150万人口。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全边区数万名干部、战士及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青年的吃穿住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鞋穿，冬天没有被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没有粮吃的窘境。于是，能否克服物质上的严重困难，成为了能否坚持抗战的关键。

还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返回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后，朱德提出要开发和利用陕甘宁边区的资源优势来解决财政经济困难。

首先，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食盐上。陕甘宁边区境内有5个大盐池，产量很大，边区内部根本消费不了。朱德提出可以把边区生产的盐销往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这样便可以换回大量资金。有了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解决财政经济的某些困难。除了食盐，羊毛也是边区的一种宝贵资源。朱德认为，全边区有羊200万只以上，单绵羊产的毛，每年就有250万斤以上。有了羊毛，可以纺成毛线、织成呢子，除了自用解决穿衣问题，也可以销往其他地方。

朱总司令不仅在战场上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勇将，在后方抓经济工作也是一个行家里手。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切实可行，措施得当有力。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当众称赞朱总司令“贡献给我们很多宝贵意见，对于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在延安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朱总司令处处以身作则。他是个种菜能手。在延安王家坪，他开出一块菜地，亲手种菜。由于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多，有些菜种是周恩来从重庆给他捎来的，他照样种得很好。朱总司令为了给菜地施肥，还带头拾粪。这样，朱总司令种的菜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他种菜不仅用来改善自己的伙食，还分送给其他中央领导，招待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每逢星期日，很多同志来看望朱总司令，他就留大家吃饭。来人也都不客气，不一会儿就把菜吃得盆见底。陈赓来看望朱总司令，总风趣地说：“我今天来打‘游击’了，要游要吃，给我改善改善吧！”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除了种菜，朱总司令还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样承担纺线的任务。开始，朱总司令身边的工作人员只会用木锤吊着纺线，速度很慢。朱总司令就和他们一起研究改进的办法。在朱总司令亲自指导下，工作人员仿照

老百姓用的纺车的样子自己造出了一架，使纺线速度快了很多。

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还是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总司令想到了我国历史上曾实行过的屯田，如东汉末年曹操就在安徽寿县等地搞过屯田。于是，朱总司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开展屯田军垦。

然而，到哪儿去找一大片荒地来开垦呢？朱总司令经过实地勘查，选择了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大约 90 里的地方，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河川两岸，土地肥沃，据说有荒地 100 多万亩，余下为森林地带。相传过去这里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后来由于清朝统治者故意挑起汉、回民族互相残杀，清兵又对这里的人民大肆蹂躏，使这里变成了荆棘遍地、杂草丛生、野兽横行的荒原。

1941 年开春后，朱总司令带领 20 多个警卫战士，还有一位农业技术员，到南泥湾去实地勘察。当时南泥湾根本没有路，战士们只能用砍刀、斧子砍出一条路来。在南泥湾朱总司令遇到一个老汉。这个老汉告诉总司令，他姓唐，原籍四川人，其父是从四川逃难来到这里的，他在南泥湾已住了几十年了。朱总司令听了，亲切地对他说：咱们是同乡啊！我们要到南泥湾来搞生产，请你当我们的顾问吧。老汉高兴地答应了。每走到一处，朱总司令都要向老汉打听，哪里能挖窑洞？哪里有水？水能不能喝？怎样才能用水来灌溉土地？一边询问，一边构思，一个全面开发南泥湾的蓝图，已经在他脑子里初步形成了。

开发南泥湾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力。这时奉调回陕甘宁边区的一二 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来向朱总司令汇报工作，朱总司令详细地把开垦南泥湾荒地的想法讲给了王震。王震立刻很坚决地答应了。1941 年 3 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 年，他们开荒 11200 亩，收获细粮 1200 石，粮食自给率达到 78.5%。1942 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 26800 亩，收获细粮 3050 石。南泥湾一带一改往日景象，到处可见长着谷子、苞米、山药蛋、烟草、麻、豆子等农作物。在宽阔的平川里，还有明镜似的水田，一望无际的水稻随风摇摆。南泥湾真正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2 年 7 月的一天，朱总司令邀请当时延安的 4 位革命老人——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一起去南泥湾视察三五九旅的屯垦。望着眼前见到的一切，联想到一年多以前的情景，朱总司令不禁诗兴大发，挥豪写下一首五言长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朱总司令竭力提倡的屯田军垦被称作“南泥湾政策”。靠着这个政策，

南泥湾连年获得大丰收，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的经济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边区军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发展了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商业、运输业等。敌人的封锁政策失败了，陕甘宁边区不但没垮掉，相反却更加巩固了。

陕甘宁边区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还带动和促进了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生产的发展，这为巩固根据地、积蓄更多的力量来迎接即将来到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八、大反攻

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经过 1941 年和 1942 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使日本侵略军日益陷入了困境。从 1942 年冬天开始，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到 1943 年，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已经逐步转入对法西斯阵营的反攻和进攻，日本侵略军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华北日军。然而，困兽犹斗。1943 年 1 月，冈村宁次宣称：今后要更进一步地“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日军又一次把作战重点对准了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各个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这个战略，在艰苦的环境中打破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其中武装工作队这种有效的组织、斗争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 年，日军的“扫荡”一次不如一次，在秋季“扫荡”以失败告终后，日军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而敌后抗日军民则把斗争的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已逐渐失去了主动权，八路军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了局部优势。

进入 1944 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败绩。为挽救危局，日军抽调大量兵力打通中国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其中从华北抽调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一一、第二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等，使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这为八路军进行局部反攻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1943 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制订的 1944 年华北的方针是：“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遵照指示，八路军和华北各根据地人民对敌人普遍展开了局部反攻，并取得辉煌战绩。

山东根据地一年间进行主要战斗 3514 次，其中进攻性战斗占 73%；攻克和逼退敌据点 1265 处，占原有敌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 4580 余人，歼灭伪军 5.4 万人；解放国土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930 万。

冀鲁豫根据地共作战 3604 次，攻克敌据点、碉堡 395 处，毙伤日伪军 1.6 万余人，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等 7 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濮县、范县、观城 3 县，共占有 10 个完整县。

晋察冀根据地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 4 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 1700 余处，解放人口 758 万。

晋绥根据地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 92 个，收复村庄 3108 个，扩大根据地面积 2.4 万余平方公里。

1944 年的局部反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加强，军队不仅数量扩大了，军政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此外，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实力也增强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包括华中、华南各根据地）已拥有 9000 万人口和 200 多万民兵，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到了 78 万人。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在 1944 年底明确提出：1945 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进入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德军已遭惨败，苏联红军在解放东欧大片地方后，准备进入德国，以最终打败法西斯德国。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在举行反攻后已进入菲律宾，并准备向日本本土逼近。2 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会议确定苏军在战胜德国 3 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日本侵略军最后灭亡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对负隅顽抗之敌发动了强有力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山东军区先后发动了讨伐伪军荣子桓部战役，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和蒙阴战役等。晋冀鲁豫军区在春季攻势中发动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南乐战役；在夏季攻势中发动了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等。晋绥军区在春季发动了以攻袭离（石）岗（县）公路为重点的攻势；在夏季又发动了夺取忻静公路西段、挤退静乐及其周围据点的攻势。晋察冀军区攻势作战主要方向是平绥路沿线及锦（州）承（德）公路以南地区，先后发动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安（平）饶（阳）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大清河战役、雁北战役、察南战役、平北战役及热辽战役等。

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春、夏季攻势之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已为时不远了。在国内，长期的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程度。但在中国人民面前仍然摆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力争光明的前途，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4 月 25 日，朱德向大会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他提出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党的七大闭幕后，朱德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从此，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党的七大闭幕后不久，8 月 8 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随即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8 月 10 日，日本向中、苏、美、英四国表示要求投降。当晚 24 时，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

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朱德又接连发出延安总部第2——7号命令，指示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以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敌伪军投降。还命令贺龙、聂荣臻所部由现地向北进攻，以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朱德还命令：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德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敌伪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长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大反攻的一天。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8月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要求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而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对此，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敌后广大抗日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日伪军发动了强大的反攻。晋察冀军区先后收复了山海关、锦州、葫芦岛，配合苏军解放了热河，并以一部挺进辽宁、吉林，还收复了张家口、怀安、万全、平山、灵寿、束鹿、孟县、集宁、只和、丰镇等市县，并一度攻入天津、保定。冀鲁豫军区兵分三路，向开封、安阳、新乡之敌出击，先后攻克延津、阳武、封丘、东阿、平阴、肥城、长清、鱼台、沛县等地。太行区部队连克博爱、辉县、获嘉，切断道清路西段，收复潞城、襄垣等地。太岳区部队攻克平陆，切断了南同蒲路。山东军区部队收复了胶东半岛大部，逼近青岛、济南，解放了胶济、津浦、陇海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此外，新四军部队也在苏浙地区向敌人展开攻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及各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庆祝中国人民反抗外敌斗争的伟大胜利。

此时的朱总司令一面和抗日军民同庆胜利，一面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他依毛泽东词原韵赋《受降》词一首，赞颂了英勇的人民军队打败日寇的功勋，揭露了蒋介石侵吞人民胜利果实的丑恶嘴脸。词曰：

红军入满，
日寇溃逃，
降旗尽飘。
我八路健儿
收城屡屡，
四军将士，
平复滔滔。
全为人民，
解放自己，
从不向人言功高。

笑他人，
向帝国主义，
出卖妖娆。
人民面前撒娇，
依靠日寇伪军撑腰，
骗进入名城，
行同强盗，
招摇过市，
臭甚狐骚。
坚持独裁，
伪装民主，
竟把人民当虫雕。
事急矣，
须鸣鼓而攻，
难待终朝。

